

# 苏曼殊爱情小说初探

李 倩

苏曼殊（1884—1918）是中国近代文坛上名噪一时的诗人、小说家。他一生共留下七篇小说（包括一篇未完稿），其中写作于1903年的政治小说《惨世界》是在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其它六篇小说都是爱情小说，这些爱情小说都写作于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1912—1917年之间，描写了青年男女在婚姻、恋爱上的曲折，不幸。表现了对特定时代特殊的认识体验。

—

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家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的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我们要分析探讨苏曼殊的爱情小说，也必须联系他所处的时代及他个人的因素来看。苏曼殊一生是在极其矛盾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度过的。他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当时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渡过时期，整个社会状态呈现出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文化不断涌入闭关自守的中国，组成了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潮流；另一方面，落后的封建经济基础依然存在，在几千年封建制度下形成的一套封建的意识形态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冲击，开始动摇，但并未从根本上毁灭。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封建时期的遗物依然大量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整个中国思想界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苏曼殊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中国早期的买办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苏瑞文以经营进出口业起家，他的父亲苏杰生是旅日华侨，在横滨任某英商洋行买办。他的家庭虽然属于早期的新兴资产阶级家庭，但其实这又是一个充满封建色彩的大家庭，这个家庭在许多方面依然保留着封建的生活习惯。如他的父亲就要有一妻三妾，而且这个家庭还明显地存在封建等级制。苏曼殊就因为不是嫡出而受到这个家庭的歧视、甚至虐待。苏曼殊的母亲也因不会封建礼教的规范而被逐出苏家大门，造成了母子的长期分离。这些都在苏曼殊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这种特殊的身世经历使他成了封建礼教的直接受害者，因此他在许多方面都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对某些封建的思想带有本能的反感。实际上从十三岁开始，他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孤身一人在社会上挣扎，过着贫富交替，半僧半俗，飘泊不定的生活。这复杂的个人经历和奇特的身世，对他复杂的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可以说，苏曼殊是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社会地位，他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对生活的理解没有落后于时代，同样他也没有能够摆脱时代给他带来的局限。他属于那种自觉地让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但在某些地方却不自觉地在原

地踏步，甚至拉时代后腿的那种人。他选择的是新思想，但却往往习惯性地带上了某些旧思想。他向往新世界，但又对完全陌生的新世界感到害怕，因此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想把新旧思想掺杂调和起来。他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创作，再加上他本人对新旧、中西多种文化的熟悉了解，就形成了他的小说那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在这些爱情小说中充满了新与旧的矛盾，新与旧的斗争和新与旧的反复，新与旧的妥协，从人物形象，思想倾向到艺术形式都明显地带上了过渡时期的特色。

## 二

苏曼殊在他的七篇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思想复杂、性格矛盾、富有时代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十分真实地刻画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曾短暂地存在过的，带有明显近代特色的女性形象。作者是通过他们在婚姻恋爱上的悲剧来塑造的。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封建文人笔下的不出闺房的封建淑女，但也不完全是那种新型的资产阶级女性。他们属于处在启蒙初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觉醒的中国妇女的一部分。她们大多受过很好的教育，有才华，有思想，而且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正在尽量争取自己人格的独立，争取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在心理上大胆自由地渴望得到爱情，在追求爱情中显得主动热情而又执着，不再象林黛玉、崔莺莺那样羞羞答答，而是勇敢地，毫无顾忌地宣布自己的爱。这些都反映了这些女性形象自信心的增强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如《绛纱记》中的五姑，当父亲因势利而撕毁婚约后，她毫不犹豫、毅然决定和她所爱的人一起出奔。《焚剑记》中的阿兰当姨母以婚姻门第之论来破坏她和独孤公子的爱情时，她大胆地向姨母宣称：“吾舍独孤公子外，无心属之人。”“士患无德义，不患无财；人虽贫公子，吾不贫公子也。”表现了一个少女纯洁的爱情观和为获得幸福爱情而作的勇敢斗争。这样勇敢坚决的斗争和坦率的表露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女性所不可能具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她们毕竟还生活在一个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没有也不可能获得独立。更何况她们还是从封建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有许多封建的遗传因子都在她们身上起了作用，她们在某些行动上，往往麻木地遵循着封建的道德规范，对于套在她们身上的层层叠叠的锁链，有时是欲挣脱而不得，更多的时候则是自甘束缚。这样，她们的反抗往往就需在一定的条件或者是在一定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如在《绛纱记》里，作者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在“余”与五姑的爱情遭到五姑之父麦翁的反对时，“余”以翁命不可违，五姑言“翁固非亲父。”在这样的前提下，两人才一起离家出奔，实际上，这些人物并没有迈出违反父母之命这一步，这就削弱了人物反抗的力量。在《非梦记》中，女主人公薇香在与海琴的爱情遭到其家庭的反对时，就对海琴说：“君既迫于家庭之命，则吾又岂容违越，愿自保爱，毋以一女子伤君之怀，吾衔恩恋德，以至于今者，以君或能娶我耳。不谓天心已定，何必更言？”这一席话充分表现了一个处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充满了矛盾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她们渴望爱情，渴望幸福，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但她们往往又以旧道德、旧习惯为标准，在自己的周围画一个圈子。总的说来，苏曼殊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丰富复杂的，在她们的性格中充满了矛盾：奔放的热情和顽固的封建道德观，逐渐觉醒过来的自我意识

和长期形成的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伦理观，对幸福的强烈渴望和对现实的险恶的处境的清醒认识，这相互间的矛盾，把她们逼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最后她们只好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或削发为尼，或以死殉情。

苏曼殊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兼有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和封建名士的双重性格。他们在个人要求、心理特征等方面往往是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他们要求尊重自我，要求个性解放，追求纯洁的爱情，反对用封建的价值观来衡量人的价值。但他们在行动上却常常与封建隐士有相通之处，每当他们生活发生挫折时，他们不是积极去争取，而是采取极其消极软弱的办法，不是到佛教中去寻求解脱，就是徜徉山水，以此来摆脱现实的烦恼。在他们思想意识中，还自觉不自觉地留有许多封建因素，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推崇；对女性的不恰当的评价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他们的落后的一面。

他们对爱情的态度不象女性那样热情，主动，常常是真心地爱着一个人，但又并不作更多的努力去争取得到她。如《碎簪记》中的庄湜，有两个女子爱上了他，而他则在两个女子和叔婶面前左右为难，最后连他自己也怀疑起自己的爱情来，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软弱，不作丝毫反抗，也不采取丝毫积极的行动，甚至在事先就做好了失败的准备。有时即使采取了行动，他们的反抗也往往会出现反复和妥协。如《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为爱情失意而遁入空门，最后却为佛教的戒规所缚。虽然他对静子有很深的感情，但他因为信守“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于女子共住”的佛教条规而放弃了爱情。

苏曼殊笔下的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结局大致相同，他们或是受不住爱情失败的打击郁郁而死，或是在失败后飘然出走。这样的结局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重视和感情的纯真。这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下所形成的那种虚伪、冷漠、自私的男性形象身上所不具备的美德，也曲折地反映了处在这过渡时期的男子身上的人性的复活。但这样的结局也同样表现了这些正在觉醒的男子的软弱，他们在失败后不敢面对现实，往往成了“行云流水一孤僧”，在“与人无爱亦无嗔”的麻木中追求一种心灵上的自我平衡，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软弱。

总之，苏曼殊爱情小说中塑造的男女形象的性格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他们身上带有新与旧、中与西多种特色，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类特殊的人物。苏曼殊受他世界观的支配，选择这样的人为描写对象，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不过他笔下的形象比较单薄，缺乏相互区别的明显个性，不同篇章中出现的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大多是雷同的，这关键在于作者没能更多地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探讨其心灵，让人物形象自己站起来，而作者常常只是把自己对人物的要求、理想加在形象身上，以此来驱使他们行动。另外这也和塑造形象反映的生活面较窄，人物的环境、遭遇、结局大致相同有关。但这些人物形象毕竟是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一类特殊的人物，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内容。

### 三

苏曼殊的爱情小说，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不满于黑暗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又不作正面的反抗，而是逃离现实，徜徉山水，去追求一种空灵的境界，常常为

读者虚构出一种世外桃源式的幻景。

在对待爱情上，往往不是积极争取，而是消极摆脱。如在《碎簪记》中，作者一再强调与女子接近不是好事情，并用所谓“天下女子，皆祸水也”来解释庄湜的爱情悲剧。这里可以看出作者虽然对男女之情表现了一种慎重、严肃的态度，但也曲折地反映了作者的胆怯，他在封建礼教的威力下畏惧了，退缩了。封建礼教是不允许男女之间有纯洁的爱情存在的，但另一方面，苏曼殊又认为男女之间一旦有了爱情，则将永远情意绵绵舍弃不了，即所谓“一丝即定，万死不更。”这样就难免要造成悲剧，于是苏曼殊就采取了一个消极的办法，不与女性接触，不让男女之间爱情存在，在他看来，这样也许要比男女之间相互有了爱情，但最终又要被迫放弃爱情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要好一些。对于一个在个性、心理等方面充满了资产阶级因素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这也就带来了苏曼殊在对待女性、爱情等问题上极其复杂的、令人费解的举动。

作者一方面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另一方面又反对男女青年从封建绳索中完全挣脱出来。在《碎簪记》里，当主人公庄湜说到在婚姻问题上“不敢有违叔父之命”时，叙述者“余”大加赞赏：“佳哉！为人之侄，固当如是。”作者在权衡男女爱情与家长之命的轻重，最后很自然地把砝码倾向了封建家长这一面。而在《焚剑记》中，作者则又通过阿兰之口宣扬所谓“女子之行，唯贞与节。”阿兰之妹阿蕙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淑女，她在嫁前数日，未婚夫发痨而卒，而阿蕙则坚守“既许于前，又何悔于后”的封建道德观念，到未婚夫家中去与一个木头人举行婚礼。而作者对阿蕙这样的举动则大加赞赏，说她“幽闲贞静，今世殆若凤毛麟角。”作者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完全象一个封建的卫道士。

另外，作者的思想深处却有着很深的封建等级观念。这在爱情小说中，主要表现在他对妇女的轻视上。作者往往重复“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传统观念，并用“吾国今日之女子，殆无贞操；犹之吾国，殆无国体可言”之说，对妇女进行有意无意的污蔑。当然苏曼殊这样评论女性，我们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我认为，苏曼殊由于受到封建意识的影响，他这样讲一部分是出于真正的内心感情，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有时是在虚晃一枪，以此来扰乱人们的视线，遮人耳目。因为从他的身份来看，他当时毕竟还是一个出家人，虽然公开地过着一种半僧半俗的生活，但有时还是难免要讲一些违心的话。总的说来，作者所要求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尊重人权，都是有一定范围和一定限度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始终是包裹在封建帷幕之中的。

苏曼殊作为中国的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已经对他本阶级的道德观产生了怀疑。清末民初，社会上的某些人已经开始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来衡量事物，这种现象也同样表现在婚姻问题上，他们不再用封建地主阶级正统的门第观念来作为衡量婚姻是否合适的标准，而是把金钱作为基础，视婚姻为生意，苏曼殊不仅敏感地觉察到这一点，而且对此进行了批判。他的作品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这种现象。《断鸿零雁记》里雪梅的父亲曾经露骨地说过：“女子者，实货物耳，吾固可择其礼金高者而鬻之。”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资产阶级当然要比封建地主阶级进步，但由于资产阶级主张绝对地

放纵个人的各种欲望，因此他们往往比封建贵族显得更加寡廉鲜耻。苏曼殊不仅在婚姻上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其它方面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例如在他的小说里，对西方的拜金主义就作过揭露，说美国人以*Make money*为要义，常说“*Two dollar is always better than one dollar*”（使大地空气能卖者，早为彼辈吸收尽矣）。

那么作者到底站在什么角度，用什么作批判武器来揭露、否定这些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呢？当时的苏曼殊绝不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高度来对此进行批判。我认为，这里的苏曼殊显然更多地赞赏的是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的道德观，一种比较进步的代表了人民思想的价值观，即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更多的注重的是情和义。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虽然显得较麻木、落后，但我们的民族却自有一种西方没有的传统的美德。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中颂扬的是那种贫贱夫妻、患难朋友，而陈世美式的人物则遭到了千万人的唾骂。苏曼殊虽然是一个接触过大量西方文化的新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带有民族心理特点的中国人，他用中国文化中一些传统的美德来抵御跟着西方文明的流入而带来的另一些不良因素，这是十分可贵的。

## 四

为适应于表达内容，为了迎合近代人的审美趣味，苏曼殊的小说在形式上也作了一定的改进，采用了新、旧、中、西杂揉的办法。

首先他对中国古典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进行了继承创新。我国古代浪漫主义小说大都重视情节的曲折、离奇，人物遭遇环境的特殊，如《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中的一部分作品，都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小说的优秀作品。苏曼殊小说显然吸收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小说的这些特长，他描写的人物大都有大起大落的命运变化和奇特的身世，情节也往往是曲折离奇的。但要表现近代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光靠这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由于苏曼殊阅读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欧洲的一些浪漫主义大师的作品，因此他就很自然地到外国文学作品中去寻找借鉴，这主要表现在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上。苏曼殊的小说不再是冷漠的、旁观者式的叙述，而是他自己心灵的呼喊，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实际上就是他的化身，他们的爱憎，他们的痛苦、欢乐就是作者自己的感情对象化的流露。特别是《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作者常常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愿望。如三郎失去母亲的悲苦，对母亲的思念，找到母亲后对母亲的爱，这些实际上都是作者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

另外在苏曼殊的作品中还注重对感情的描写，作者从封建的枯燥的理性主义和对感情与幻想的种种禁忌中解放出来，用大量的笔墨描写男女主人公在爱情发展中的缠绵悱恻的感情纠葛，大胆地追求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感情联系，这在《碎簪记》《非梦记》等小说中都表现得很突出。苏曼殊小说中的这些浪漫主义特点，为中国近、现代出现的一批独特的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其次，苏曼殊在对爱情的描写中还集中国古典爱情小说和西洋爱情小说之长，既不失中国古典爱情小说的典雅含蓄，又具有西洋爱情小说的大胆热烈。他往往描写人物感情的热情奔放，而在行动上却是矜持的，在表白时是大胆而又直率的，但在接触中却是

有分寸的，而在结局上，则一反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而是按照生活的真实，给人物安排了一个个悲剧性的命运，表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在社会恶势力的摧残下的毁灭，起到了一种叫人从麻木中清醒的作用。

另外，他还把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静态画面美带入到小说中。他的小说不仅有诗一样美丽的语言，而且有诗一样美的意境，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因此我们读他的小说常常觉得是在品味一首诗歌或者是在欣赏一幅完美的图画。

当然，由于苏曼殊写作小说的时代还是中国小说改革的初期，因此在艺术上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对小说技巧掌握得还不够娴熟，在有些作品的结构安排上显得不够协调，不够完美。如：《绛纱记》在一个较短的篇幅中，描写了四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给人来去匆匆和东拉西扯的感觉，其中每一对男女青年的感情发展又都不能表现得详尽而深刻，因此就很难真正打动读者。

苏曼殊的爱情小说，为辛亥革命失败后寂寞的资产阶级文坛增添生气，也为我国古典小说向现代白话小说过渡奠定了基础。

---

（上紧接第18页）象《万首唐人绝句》的说明里也说某人看的，我想如果不是敷衍塞责就是水平太低（那样的书，不如原版缩印为好。）所以请专家把关，必须是真正的专家，切切实实地负责把关，看稿的时限应该稍微放宽一些。

三、出版单位应热诚欢迎社会上对本社出版物提出的正确批评意见，和一些热心的读者加强联系，决不能惜疼护痒，害怕批评。这一点我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做得好的。1981年我在《徐州师院学报》第二期上发表《读校随感录》一文，中间涉及该社《容斋随笔》，他们就摘登在内部刊物上引起注意。别的出版社怎样，我就不大清楚了。凡是给“上古”提出校点疏漏之处，他们都能及时回信，因此也就乐于随手摘录寄去以帮助修改。我想出版社应该提倡这种作法。比如说中华书局总也有这种古籍整理之类的内部刊物吧！能不能把这篇批评登出来以提请注意呢？

总之，我希望我们的古籍整理质量要上不愧对祖先，中不愧对今日，下不愧对子孙。

## 江苏省五所师专协作编写 《中学语文教材教法》教材及参考资料

省高教局教科处主持召开的全省师专《中学语文教材教法》教材编写会议，于一九八三年底在南京举行。会议决定编写一套全省师专的通用教材《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由万恒德副教授任主编，滕碧城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有顾明章、陈景贤、李定华、赵伯英、李家珍等。这套教材每章都设计有思考和训练题，力求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学和用取得一致，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理论并转化为教学能力。教材重视吸取传统经验和当前教学实践中的新鲜成果，对国外有用经验亦有所借鉴。

与主要教材配合还编写一本《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参考资料》，作为辅助教材，由李家珍主编。